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像突然袭来的飓风，短时间就席卷中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进一场长达10年多的浩劫之中。这场灾难来临时，人们普遍不知它从何而起。且不说普通老百姓，就连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普遍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人们只能从最高指示、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中去“领会精神”，从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中去“猜测动向”。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使“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混乱而朦胧的色彩，人们难以窥其究竟。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同时，党内外人士、中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大量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索，更成为研究的热点。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去寻找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些可贵的努力，开始拨开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层层迷雾，使大家能看到一些因果联系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但是，由于众说纷纭，头绪繁多，使人目不暇接而又不明晰确知。似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甚至有人说：“五十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认定“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然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别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

所存在的主要弊端，如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在别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尽管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不同。而那些国家虽然也出过一些乱子，却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把那些乱子如有的同志那样称作“小文革”或是“文革的派生形态”呢？显然不能。事实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笼罩着反修防修的神圣光环，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全面夺权。显然，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借助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揭示出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俾能成为借鉴。探索“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能对当时和之前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出具体的、主导的原因。以“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为实例，加以推演，同“文化大革命”挂上钩，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理，也能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但那还不能弄清“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还不能成为历史科学的解答。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出了科学的论断。经过二十几年时间的考验，证明那些主导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深刻中肯的，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权威性文件。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

这里说的“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主要是指 1957 年以后。为什么要以 1957 年作为一个分界线呢？因为在 1956 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那时党内发生的“左”倾错误，主要是把朋友错当作敌人，扩大打击面，缩小同盟军；在斗争中采取了不适当的策略和手段等。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剥削阶级已基本上被消灭。因而党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从主要是“打碎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所以 1957 年后的“左”，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认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等问题。这时的“左”倾理论和实践既与过去的“左”有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等方面的联系，又有客观社会条件和理论实际内容的重大不同。弄清楚这一区别，对于搞清楚是何种“左”倾理论和实践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从客观历史进程看，1957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也确实是从对国内阶级形势估量的不当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的。

本来，在中国大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作出了正确决议，提出主要矛盾转化、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1956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表述，在文字上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一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都超越了生产力，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一种好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好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在于它能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它的先进性就值得怀疑，并不是越大、越公就越先进。二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存在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了。尽管“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达在文字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它们要表达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能够给人一个很明确的认识：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否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宣传的那样，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货色”呢？不是。事实是：刘少奇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过程中，和毛泽东一起多次反复研究，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认真修改。毛泽东认为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题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下边又写了“刘少奇”三个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称赞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可见，对政治报告毛泽东是亲自参加了修改的，是赞同的。

在“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中有关主要矛盾的文字表述，的确表示过需再斟酌。比如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从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来概括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此前后，他曾多次提出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好各种矛盾，以便集中力量“向自然界斗争”、“向地球开仗”等意见。但是他没有进行理论概括，这表明他还没有考虑成熟。可见，在主要矛盾转化的根本问题上，他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在审议“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

案时提出了一种意见，指出如果单提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容易使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同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提法，虽然有些勉强。

“八大”以后，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匈牙利事件^①，西方国家趁机掀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在这场大风暴面前，中国共产党是沉着的、冷静的。从总体上看，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判断。但是，由于毛泽东从匈牙利事件中总结出的一条最基本教训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以后对国内发生的矛盾和事件的分析和决断。

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也促使毛泽东用很大精力去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围绕着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在北京和外地发表过多次讲话。1957年3月他在天津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结束了。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不完全结束，是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作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在同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上面所引用的史料可以看

^①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20万人大游行，要求清除前领导人拉科西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并要求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复职。示威中发生冲击广播电台、电话局、军火库的流血事件。纳吉上台后，事态又有新的严重发展。以卡达尔为首的一批党政领导人另立工农革命政府，请求苏军出兵镇压，11月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平息了动乱。对于这个事件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

出,直到 1957 年初,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仍然是同“八大”决议一致的。

反右派斗争 的严重影响

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反右派斗争爆发了。这被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这场“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反右派斗争不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其家属遭到很大的不幸,而且迟滞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助长了“左”倾思潮的膨胀,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有重大影响。

反右派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发生的。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为了适应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便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 月 30 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上公开发表。5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号召动员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全国出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热潮。绝大多数人都是善意的。但是无可否认,在某些地方和单位确有极少数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敌视的分子,他们受到匈牙利事件后国际反共高潮的鼓舞,趁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兴风作浪,妄图推倒党的领导地位。一部分群众在帮助党整风中,或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或由于思想偏激,发表了一些措词尖锐、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言论,进行了请愿、游行等活动,一时间产生了混乱。对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起先是估计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看得并不严重;

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和舆论宣传，鼓励大家大胆鸣放。后来，他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认为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如不反击，有些党组织可能垮台。于是就动员全党反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从而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这中间的变化，从 1957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份党内指示中可以看出端倪。文件认为，在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在事隔两年之后的 1959 年，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事件。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判断中国情况的影响，也可以作为反右派斗争所以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做法的注脚，从中还可以看出这场“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的。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是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失误和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突然改变。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毛泽东接连写了许多篇指示、文章和社论，对阶级斗争问题都作了过分严重的判断。如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作出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判断，这就把资产阶级又看成是一个完整存在的阶级。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并且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

就是证明。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为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以这一系列‘左’的判断为基础，在 1957 年 9 月至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果断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话是对一年前召开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根本性改变。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得到了这次中央全会的赞同，由此必然引起全党主要任务和整个政策的相应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和决策失误。

对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在八届三中全会一次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加解释。他说：“八大”文件中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服服帖帖，问题没有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中的问题，当时都看得很不清楚。经过这次大鸣大放，资产阶级要造反，问题就看清了。因此应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这段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届三中全会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的反映。

对错误的实践进行概括，抽引出错误的理论观点，以此指导实践，再进行理论概括，使错误理论一步步升级，又据以指导实践，这种交互作用，始自反右派斗争。

派生出一系列错误

由于对主要矛盾作出错误判断，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上，必然会派生出一系列的错误判断。

首先，要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一个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1958 年 3 月，毛泽

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这一观点在同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中加以确认，并解释为：两个劳动阶级是指工人和农民，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样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就以代表大会的权威，正式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同时，也改变了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知识分子属性的正确判断，即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八大二次会议重新把知识分子一般地错划入资产阶级范围，其原因是清楚的。反右派斗争中划了55万右派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①。所以当时出现一种理论，认为老的资产阶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财产被剥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能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而知识是在头脑中剥夺不了的。所以他们有本钱，能够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对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判断，显然也是从反右派斗争错误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认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大陆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在理论上必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只能从经济关系中，即从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中，才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特征，也才能提出判别和划分阶级的依据。这些理论观点，马克思、列宁都已经作了充分论证，本来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在实践中也是照此办理的。中国共产党在

^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当时全国划定的55万右派分子进行了复查，属于错划而得到改正的占98%还多。

长期工作中，无论是土地改革或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根据人们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占有什么，占有多少，如何使用等经济状况去区别阶级的。因此，认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国土地改革早已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根据什么说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呢？这是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力图对此作出回答。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在同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一份手书的发言提纲上写道：不忙于宣布消灭剥削与消灭阶级问题（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就提出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背离的，所谓除了有“经济剥削的阶级”之外，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的逻辑推演，必然会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从历史唯物主义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开端，从而在指导实践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有害影响。

这个失误仍然是来源于错误的实践。反右派斗争划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按照历史上和当时人们政治思想的表现进行的。运动后期还制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虽然订出了16条“标准”，规定什么情况该划，什么情况不该划，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还是划错了。要想找出一种能够衡量人们政治思想的尺度，据此区分其阶级成分，这是不科学和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的政治思想情况不可能是单纯的、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变的，表里可能是不一致的。按政治思想划阶级的非科学性也表现于此。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确立后，按照

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能迎刃而解的哲学观点，抓阶级斗争逐步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至经济生活的主题；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思潮，逐步在党内和社会上急剧发展。

“左”倾理论 的重大升级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其内容虽然主要是同自然界的斗争，但却是在反右派运动后，“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插红旗 拔白旗”、批判“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等政治压力下，大轰大嗡地掀起来的。也可以说是企图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尽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尝试。“大跃进”运动初期；左”倾思潮泛滥，“共产风”盛行 给各方面工作带来恶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注意到这种情况。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一直到上海会议，都为纠“左”作了一定努力。但这一系列纠“左”工作的重点均放在一些实际工作方面，而没有涉及运动的指导思想。待到1959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突然由纠“左”转而反右，以更“左”的形态，提出了共产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使“左”倾理论观点又一次重大升级。

庐山会议召开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已经明显暴露出来。会议是为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的信，其内容归结起来，只不过是认为除了纠正实际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外，还应清理一下指导思想方面的“左”的问题。这封信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表达方式上，历史已经作出结论，都是正确的。可是，这封信却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成为当时压制、打击党内外对“三面红旗”^①有怀疑的

^①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当时的报刊上通称为“三面红旗”。

人们，发动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全国性运动的由头。批判彭德怀的错误实践，又推动毛泽东作出理论上的新概括。他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错误地认定是阶级斗争，从而把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共产党内。

紧接着庐山会议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把在庐山会议上发言表示基本同意彭德怀观点的黄克诚（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周小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同志打成所谓反党集团。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全会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本来当时全局性的错误倾向是“左”，却反其道而行之，号召全党全国反右，必然推动“左”倾思潮更加泛滥，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八届八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掀起一场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右倾”斗争。有些干部在“大跃进”中已经“左”得可爱了，仍然要检查自己的“右倾”；许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讲了几句真话的人，被打成“右倾分子”。从此，“三面红旗”被奉为神明，不允许对它有半句不敬之辞。

在“反右倾”的冲击下，不仅“左”的进程被打断，而且不顾已经逐步展现的经济领域的严重困难，又提出了“持续大跃进”的口号，从而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这成为造成经济比例失调，物资严重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不幸局面的主要原因。

关 键 的
八 届 十
中 全 会

按政治思想区分阶级和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左”倾理论的一根重要支柱。这种观点的确立，导致人们将阶级斗争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党内，致使党内关系紧张，政治生活不正常，这已经蕴含着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基因。不幸的是，理论认识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得到纠正，而且在实践中步步加深，终于形成完整的形态，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成为进行各项工作的指针，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群众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及其前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多次讲话。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他要求全党对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要搞一万年。这些话后来被概括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教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他这次是“重提阶级斗争”。这话需要分析。如前所述，阶级斗争一直是他谈话的重要内容，是他抓工作的重要领域，从来没有放松，更没有放弃过，无所谓“重提”。但是这次“重提阶级斗争”确有某些特殊背景。

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人们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对“三面红旗”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思考。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在讨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各地、各级负责干部都在发言中相当普遍地对涉及“三面红旗”引

发的一些问题，表现出不满情绪。毛泽东虽然宽容地提议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并在讲话中原则上表示对某些错误要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透露，毛泽东对那次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有对林彪（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在会上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发生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这些严重违反客观实际的有意阿谀之辞，却得到毛泽东的欣赏。

当时，党内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鉴于1962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需差距很大，认为还处在“非常时期”。对于某些政策措施，如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给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平反等工作，都有不同认识。党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甚至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的，经过调查研究、民主讨论，也是可以解决的。而毛泽东却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和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实践作了错误的判断和总结。把与他不同的意见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把这种分歧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甚至认为这就是在党内，在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进而提出了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迷雾急剧发展。

在这个期间，国际国内形势的某些变化和发展，也对党内“左”倾

思潮产生了促进作用。例如：中苏两党的争论日益加剧，分歧公开化，并影响到国家关系。苏联领导人持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在 1961 年后逐步介入越南战争，由出钱出枪的“特种战争”，到美军直接参战，战火逼近中国南大门。印度军队也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我国新疆、西藏地方。在国内，台湾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利用当时大陆的暂时经济困难，叫喊“反攻大陆”。社会上一些反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趁机进行活动，各种犯罪现象有所增加。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及时提醒全党注意抓阶级斗争问题，这无疑是有相应的客观需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时期、一定范围出现阶级斗争某种程度的激化，却被看做全面的阶级斗争，并把阶级斗争置于笼罩一切的地位。这是对党内矛盾和国内外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量的结果，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在理论上的一次后果严重的失误。

社教运动
掀起
“阶级斗争”

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会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省保定地区进行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查出一些干部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中共湖南省委则用 3 个月的时间，以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训练了生产队长以上各级干部 120 万人。通过训练，使这些干部接受这样的认识：“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也是严重的”。湖南省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应该“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张旗鼓地刮东风 打击敌人 遏止黑风”。

毛泽东在 1963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开

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据此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就这样，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又一次逐步地向全国推开了。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指导下，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地区和单位中，一抓就抓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揭露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就在1963年9月，毛泽东正式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把阶级斗争放在“纲”的位置，实际上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已经得到确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势必把一切工作统统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指导，采用许多强制方法，把一些被怀疑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对一些生活作风、工作作风有这样那样毛病的干部，往往在证据不实的情况下，视为坏人。这样就抓出了一批所谓的阶级敌人。这就造成“不搞不知道，一搞吓一跳”的错觉。吓了一跳之后就检查右倾，反右倾，然后再去抓“阶级敌人”。越反右倾思想就越“左”；“阶级敌人”抓得也就越多。多了就再吓一跳，再检查“右倾”再去抓，形成一种交互作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只在局部地区和单位开展，后来又纳入“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够形成席卷整个大陆的全局性政治运动，但它在社会上造成的震动和影响却是极大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曾经对政策进行过几次调整，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中造成的损失。但是，通过这场运动，“阶级斗争”的范围越斗越广，“阶级敌人”的数量越斗越多，造成了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重的假象，这种假象对于领导决策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左”倾理论的升级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1965年1月，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认为：“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进一步为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共产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提供了理论政策的依据。

意识形态
领域的
过火批判

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由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组织人写的文章，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当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政治批判，声称这些文章和作品，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此后，全国报刊上对一系列小说、电影、戏剧如《刘志丹》、《怒潮》、《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进行批判。这些受到批判的作品，多数是这一时期创作和放映的比较优秀的作品，而在当时，却被认为都是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给戴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看过这些相当受欢迎的作品的人，对于这